



論人民民主

著 陳仁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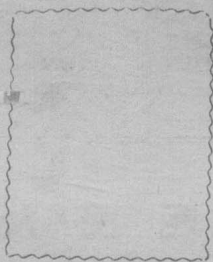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論 人 民 主 義

著 陳 仁 炳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50



著者

陳

仁

炳

發行者

孫

汝

梅

出版者

時

代

書

局

上海四川中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八九五四號

印刷者

協

興

印

刷

公司

上海海寧路七八八號
電話四二五八三號

基本定價

五

元

六

角

出版日期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論人民革命

方生的已經在轉瞬（雖然「轉瞬」就是廿年！）中壯大，未死的也已經瀕於斷掉最後一口的呼吸，我們廿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人何幸而能够眼見並且參與這方生者未死者之間的偉大的生死搏鬥！作爲時代的一份子，我們最低限度要正確地、澈底地、明白地認識正在勝利中的這場搏鬥——認識中國人民革命。

首先，我們要認識中國以及世界革命的必然性。今日全世界乃至中國的政治經濟局勢現況，往遠處說，是二百年以來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發展所造成的總結果，往近處說，亦是近一二十年國內外各種經濟政治因素交互作用及矛盾的發展底必然的開展，革命的實現及其最後的、全盤的成功，都是具有高度的不可避免的。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的發展，它不可避免地變生了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開拓了大片殖民地，殖民地在經過壓榨以後不可避免地走上獨立反抗的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法西斯主義以企圖解救它末期的僵化；但是法西斯主義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敗亡的路；在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還保持着半封建的國家裏（如中國），特權統治階級及其頭領們不可避免地會去企圖勾結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以鞏固其自身的存在，但如蔣介石這班法西斯帝國主義

走狗們的最後命運也不可避免地是傾覆和滅亡。何以故？因爲人民革命（世界的及中國的）有其不可避免性，革命的成功亦有其必然性。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了它的內在的根本矛盾，它一方面必然地造成了大眾的最後替它掘墳墓的無產階級，一方面又必然地爲自己安排好了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的牛角尖。凡它企圖用以解決自己矛盾的工具有，最後一件一件都變成了毀滅自己的武器。今天，雖有以美帝爲代表的最後堅強的掙扎，但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裏苟延殘喘的歲月已經屈指可數了。今天，美帝在中國的走狗頭子蔣介石亦已只剩下僅有的一口氣了。在今天，我們特別要加強學習歷史，學習在世界史和中國史裏，革命如何表現其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革命是如何地如同瓜熟蒂落一樣、如同水到渠成一樣，在一個階段一個環境內成功了、實現了。新民主主義所要完成的人民革命，這一個反封建反帝的革命，這一個走向（而不能再立即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定也會成功的，因爲它是在履行歷史上特定的此時此地一階段的革命任務，爲未死者送死，爲生者作養扶衛護的工作。

其次，我們要認識中國以及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因爲僅僅認識革命的必然性是不够的。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不但教人們如何認識革命的必然性，更重要地，他教人認識革命的必要性，教人知道如何非革不可。革命家的任務，是對於歷史執行一種催生婆的職務，叫方生的穩穩快快的生，未死的乾乾脆脆的死。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把新社會的因素解放開來，這些因素都是已在舊的、正在崩潰中的資產

階級的社會本身中孕育了的。」這樣看來，革命絕不完全等待着舊秩序自行崩潰，等待新的、已經孕育了的新生命自行呱呱落地。孫中山先生也懂得這點契機，所以他在「錢幣革命通電」中說：「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

革命就是對於舊秩序的統治階級的一種篡奪。可是天底下凡是一個統治階級從沒有自動允許篡奪的，馬克思說得好：「資本階級祇允許勞動階級一種篡奪——戰鬥。」馬克思又說：「革命的中心任務與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以戰爭解決問題。」根據這個道理，毛主席多年以來即提倡「以戰爭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若不是由於人民革命的武裝力量，配合全國人民的革命意志，今日四大家族的統治權，恐怕仍不得動一根毫毛。所以人民革命在今天，絕對需要武裝的戰鬥，它是必要的，正因為革命是必要的。過去若干歷史的場合中，有人存着「與虎謀皮」可以成功的幻想，近一兩年國內法西斯的瘋狂表現，已經十分之十打破了這個幻想！要謀老虎的皮，給全國人民享用，只有先殺了這頭老虎。這是革命的必要性。毛主席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實在正確。

最後，我們要認識中國與世界革命的不可分性。這一點我們的經驗是很深刻而慘痛的，尤其是最近年美國帝國主義幫助蔣家朝廷進行反人民戰爭，企圖在中國建立東方的反共反蘇根據地，作為美國以世界資本主義盟主身份所進行的保衛全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存在的最後掙扎奮鬥計劃的一部

分。美國意想不到，中國竟成了這個大大的夢想計劃的首要的破壞者。人民民主的中國，不但將要粉碎美國在中國的迷夢，而且，通過中國人民革命在東南亞各地所起的革命作用，勢將要把美帝在亞洲的整個反動計劃全部粉碎。中國革命確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部偉大的革命史中，我們中國人民，將看見帝國主義從人類地圖上逐漸消逝；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民主國家一個一個的在各個角落建立起來，迎接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世界。這個迎接新世界的角聲也就是全世界革命的號角。但我們堅定信心以前，我們需要明確地由實踐去認識人民革命。

（展望、一九四九、五月、特刊第三期，原題爲：如何認識革命）

都市與革命

一 「學會建設城市」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對於「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報告，現在已成爲大家很熟悉的文獻了。它的要義可以包含在以下摘錄的這一段裏：

「從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重點是在鄉

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執行了這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並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從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今天，除了廣州重慶昆明等少數以外，多數大都市均已解放。因此，在今天，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最中心的問題確實就是城市問題，或者不妨用比較通用的詞句，都市問題。這其實不止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在人類經過數十萬年的歷程克服自然、創造環境的成績裏，城市（或都市）無疑地是一種最輝煌奪目的「展覽品」了。古埃及、巴比崙、地中海、中美洲的文化，無一不表現在當時當地的都市的建築上面，希臘、羅馬和華夏的古文明，如何能和雅典、羅馬和長安、洛陽、北京分得開？尼尼微、所多瑪、俄眉拉、推羅、西頓等古代名城的盛衰興亡，幾乎包括了全部的小亞細亞古文明的史詩。墨西哥的古文明，今日也祇能由二三處古城的廢墟去憑弔。陸機陸雲之流所歌詠的三都兩京的盛況，今日却只能透過歷史的描繪去想像了。如果維蘇維火山的洪流沒有在一剎那間活埋了邦貝古城，我們今天又那裏會有眼福目睹數千年前人類同胞的宮室之美，服用之盛和燕妮生活之隱秘？

一部人類剝削與反剝削，專制與反專制的漫長的歷史原來都寫在都市的城牆上。隨着時代的前進，革命階段的推移，和力量地位的轉變，因之，是「下鄉」或是「進城」，完全

要隨情勢和需要來決定了。在北平解放以後，報載有人曾以輕鬆的語氣說：「今天我們這些『鄉下人』進城了。」其實，這寥寥數語，無意中爲歷史的新頁提出了一則標題。革命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由歷史看來，其意義確是非常重大而深長的！

二 城與鄉的對立

在人類歷史上的重重的矛盾與對立之中，城與鄉的對立要算是相當古老的了。嚴格地說，奴隸的勞力建築了最早的城市，封建制度奠立了都市的規模，但現代大型都市的建立，仍有待於資本主義的突起勃興，和封建社會的解體。可是橫貫在這幾個階級的歷史裏的，却是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封建制度，雖然在各國的發生史不同，但在剝削的原則之下，無疑地是直接間接產生許多都市的基礎。在歐洲中世，在中國封建時期，均是如此。周承殷商之後，周人率領着「接收」過來的集團的民族奴隸（民），去開啓疆宇，開始建立駕馭農村的都市。所謂「國」字，原與「城」字同義互借，孟子：「國人皆曰可殺」的「國人」，實際上即「城」內的統治階級和自由人之階級的稱法。封建社會的理想本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孟子）站在正統講話的左

傳，還要添上一句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那末，這班「君子」「勞心者」「治人者」「食於人者」是住在「都」或「城」裏的，「小人」「勞力者」「治於人者」「食人者」却擠在外邊——「野」，也叫做鄙。階級分野分得清楚，叫做「都鄙有章」。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牛羊茁壯而已矣。」「鄙事」原來即「鄉下人的事」之意。樊遲問稼，孔子不高興，斥之爲「鄙人」——鄉巴佬。孟子稱「小人」爲「野人」，並乾脆地說出：「無野人無以養君子。」

城市本就是建立在階級的對立和矛盾上的。這種對立和矛盾，在資本主義時代表現得特別顯著。史家桑巴特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季子中譯本，一卷第一分冊頁九一）裏說：「城市是倖賴鄉村的剩餘爲生的，牠的生活條件，牠的生活活動的餘地，是以牠能够取得這種剩餘生產物的多少爲轉移的。」——這不是活畫出一幅剝削與寄生關係的圖像麼？桑巴特以爲中古城市起源時代多爲「消費的城市」，他說，「凡不是用自己的生產物去支付牠的生活品的城市，我稱之爲消費城市。」誰是這些不事生產的人呢？「以徵收賦稅爲生的君主和收取地租爲生的地主。」後者還算是用經濟手段剝削的，前者簡直就像現代所謂用非經濟手段來剝削的人們了。我們看歐洲史就知道，今日許多大城，在其起源時期，除要塞以外，幾乎不是一個貴族的宮邸所在，便是一個大天主教的座城。中古的大城市裏，依收取地租爲生的人異常的多。戰前南京鎮江等城，收入最優裕，而生活最悠閑的，據說就是靠房地產吃飯的「房牙子」之流，似可與歐洲的經歷相印證。但歐洲的城市漸漸建立強大的工商業，建立龐大數字

的工廠，開始向工人身上剝削，更進一步向海外殖民地擄取。沒有初期專門加於農民頭上的剝削的比較單純。

在跨入資本主義以後的國家裏，很奇怪的是，偏偏多數仍然保有這種城鄉之間的對立與矛盾。城市向鄉村汲取原料，購取食糧，然後又以製成品或加工後的產品賣給鄉村，轉幾道手之後，弄來弄去，吃虧的一定是後者。所以即在號稱工業文明發達的國度裏，「鄉村」就是窮困、黑暗、落後、衛生醫藥欠缺、教育簡陋……一切退步停滯的代名詞。在拜金的美國此種對照即極為尖銳。「鄉下人」動輒負債纍纍，入不敷出，糧價高則百物亦高，生活維艱，糧價低則「穀賤傷農」，亦難活下去。至如我國農人，受封建與帝國主義及內戰政治之三重剝削，所受的痛苦，又那裏是「三徵」所能括盡的？近年革命浪潮之由鄉村衝向城市，由無告的農民指向有產有閑的寄生階級，如水之向下，正是極自然的求平的革命過程。

三 工業化資本化都市化的交互關係

近代大都市的建立，始於封建制度崩潰之後；封建社會被否定了，桎梏住的生產力得到一度解放，才使規模恢宏的現代都市成為可能。這是因為，現代工業化及資本化的大都市，與古代社會及封建社會裏的城市之間，不僅存在着量的差別，亦有質的迥異，自古及今，都市的演變，是由量變到質

變的，不止大小的不同而已。古代沒有真正大都市。依現代意義所謂大都市，如大紐約之擁有一千二百萬人口，大倫敦之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如在前工業的農業或手工業時代，此等千萬或五百萬以上人口城市之龐大的運糧問題、供水問題、排穢及垃圾問題、及交通集散的工具有及道路問題，都是不可思議無法解決的。亞力士多德心目中理想城市以一萬人爲度。中世紀歐洲所謂大城，其人口往往僅數千人。一六〇〇時，全世界在十五萬以上之城市不過八個。同等大小的城市，在一八〇〇時亦不過十五個，七所在歐洲，美洲一個也沒有。其時，美國萬人以上之城僅有六個，當時最大的菲拉德非亞也尙不足七萬人。到一九三〇時，全世界在十五萬以上的大城有三百以上，人口達百萬左右的亦有四十三個！一七九〇時美國人只有百分之三寓居城市，而一九四六年的城市人口是百分之六十。英國居住城市的人口百分比率更大些，已抵百分之八十。但如以住居在十萬以上的較大都市內的人口爲「都市化」計算的標準，則英國係有百分之四十五。二的人口在此範圍內，美國則佔百分之廿九。六。德國「都市化」的程度恰比法國高一倍；前者比率爲三〇。二%，後者只有一五。七%。又如就從事於農業以外的職業的人口，佔全部就業人口的百分比來分析，則英國亦爲最「都市化」的一個國家，因爲英國人只有百分之七從事農業，百分之九十三非農業從業人員。依這個標準，各國「都市化」程度高下的順序應該是：英、美、荷、德、法、瑞典、日、意、印、蘇俄等（但蘇俄近年位置一定跳升了）。我們中國以號稱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成份，在「都市化」的序列上，恐是敬陪末座的了。

(參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Urbanisation」條)連最爾日本也高高在我們之上。

現代各國的急遽都市化，其實不足爲奇，只是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副產品。試以高度資本化和都市化的美國爲例，美國由一八五〇至今一個世紀間都市化的進度與工業化的進度是若合符節的。美國產業工人數目在一八五〇是九五七、〇五九，生產品總值(千美元)在同年是一、〇一九、一〇七。美國在一八五〇年都市人口僅佔全體百分之一五·三，可是到了一九二〇，都市人口佔百分之五一·二，產業工人總數亦昇至八·四二三、九六四，生產總值達六百億美元一年。一九四六的都市人口比例昇到六〇〇，產業工人數目無大改變。

根據這個，極顯明地，在過去都市化與工業化幾是齊頭並進的，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以後，產業工人數目改變小，都市化數字改變亦小，僅略有加增。如細加分析，我們可看見人口都市化之進度，與工業化的速度，成爲相關很高的正比例。

近代大都市的興起，除由於工業上之需要而吸收勞動人口，集中於大中心點以外，近代商業之發達，貿易之世界化，交通工具之進步，航海之發展，殖民地的擴展，海外市場的建立，金融網的遍佈全世界——總之，現代資本主義的樹立以至獨占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解釋「都市化」的主要關鍵，是促成「都市化」急遽進行的主要刺激。今日世界的頭等「大」都市，如倫敦、上海、東京、紐約等，幾全爲海岸或近岸的吐納港口，芝加哥與漢口亦因受此限制，迄不能成爲天字一號大城而屈居稍次的

位置。原稱世界第一大都市，亦即爲金融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發號施令的大本營之倫敦，三十年前，將第一把交椅含垢忍辱地拱手讓與紐約，豈屬得已？國際形勢改變，經濟威勢移轉，亦是無可如何之事。上海區區彈丸之地，而擁有六百萬人口，亦是由於執行半殖民地公共跳板的任務，作爲帝國主義最寵用的集散地。上海由一八八五（公共租界）的三十餘萬人變爲今日的「大上海」，又有多少算得我們的光榮？不過，上海在最近三十年中亦同時成了民族工商業的主要陣地，全國金融中心，以及文化出版中心，如非因內戰的摧殘，和野心專制的家臣們的蹂躪，上海在近三五年中不知尙可能對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增加多少貢獻！我們在今天計劃到新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時候，當不忘善爲利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這一些已有的都市基礎。我們正可以利用原係帝國主義造來自用的基地，一變而爲新民主主義之下民族工商業和大規模國家經濟公營事業的新發祥地。中國不可避免地在一個階段內是要走向一個都市化的社會的，因爲那是一個國家工業化的必然的伴隨的過程。我們的課題乃在如何革命的過程中，一面執行打倒封建、掃除帝國主義的任務，而同時有效地、迅速地、堅實地進行工業化、現代化中國的工作，並如何在達成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中，消滅不合理的城與鄉的對立。

四 建設新民主的都市

綜合起來說，現代都市是資本主義及其引伸——帝國主義——的副產物，是工業與資本主義的結

晶，是封建剝削形式的冷藏庫，是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對立中的佔上風者的大本營，是一切投機取巧欺騙壓榨者大顯身手的陣地，是勤勞大眾被吮吸被宰割的屠場，是藏垢納污的臭水溝，但也可能叫它成爲新生革命力量的血庫。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最後崩潰於都市的崛起，當時的口號是「都市給人自由。」古例，農奴逃入若干城市，隱匿了一年零一天之後，即可得到自由地位。現代都市生活給千萬平民以集中與接觸的機會，人們由接觸而生思想的溝通，由集中而增組織的機會，都市裏的工人、店員、「白領」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早晚是會睜開眼睛，會站在一起的。所以，自由科學工業發達以來，世界史上，所有由勤勞大眾和覺悟的知識分子發動的革命，多半是以都市爲起點，此決非偶然。這是歷史的和環境條件的命定。

現代都市，在燦爛外衣之下，不知包含多少醜惡和矛盾，大致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都市，在華貴的天堂外表背後，一定藏着一大片地獄式的貧民窟。離上海高入雲霄的國際飯店不到一英里的區域（江甯區普陀區）就可以看見人間活地獄相。英國在二次大戰中，將倫敦大部份兒童（一百萬以上）疏散到鄉下貴族闊人公館去，由於調查工作，有許多人這才發現倫敦城內某些區域裏的不可想像的貧困和愚昧。現代都市本來是建築在剝削和糜爛腐敗的寄生的根基上面的。在中國，這個基礎一定要重新翻造一過。才能談得上如前引文獻所說的「從新開始由城市領導鄉村」的革命工作。一個建築在科學化、工業化的基礎之上。而同時能逐步地清除資本主義所佈下的寄生性的、糜爛性的文化毒素的都市

化過程，將形成人類文明史上最新的成就。但清除剝削和黑暗是必要的，革命如不能毀掉都市裏的一切糜爛和寄生，那末都市裏的寄生和糜爛的一切就會毀掉革命。可是我們有這個堅決的信念，相信我們一定能應用新民主主義的四面八方的原則，把都市搞好，完成革命的使命，建立新民主的都市。

（一九四九、四、一五寫於上海，八、十改寫，刊於一九四九、九、十三、文匯報）

爲了將來而死的人們

——紀念李聞陶杜四革命英烈——

羅曼羅蘭在他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最末一卷的結尾一段裏，象徵地寫那位自由戰士的死。大意是這樣的：

「聖者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他整夜在逆流中走着。他的結實的身體像一塊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頂着一個嬌弱而沉重的孩子。他的脊骨也屈曲了。

在激流的澎湃中，他只聽見孩子平靜的聲音——『走罷！』

他走着，僵着背。突然，天又黎明！克利斯朵夫終於達到了彼岸。於是，他對孩子說：

——我們終竟到了！你多沉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誰啊？

爲了將來而死的人們

——我即是將來的日子。」

聞、李、陶、杜、四先生，他們在不同的日子裏，在多少不同的情形之下死了，但他們的死是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爲了將來，爲中國的和人類的將來，爲了一個「將來的日子」。

在生活着的時候，他們每人身上各担了一個沉重的孩子——一副不同的担子，每一付担子都是沉重的。沉重到幾乎要僵僵着走。

一多先生，爲了要以昆明爲起點，以戰時學府爲起點，以文藝崗位爲起點，以唯物史觀的眼光重新整理中國文學史的工作爲起點，以反專制反獨裁反法西斯特務的工作爲起點，盡他的責任，他担當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公樸先生，他領導青年民主運動，他在險惡的環境裏爭取民主和平，他努力辦社會化大衆化的教育，他直着嗓子唱、喊、呼籲、「煽動」、鼓勵。他也負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行知先生，他以一生的精力把中國的死教育弄成活教育，把貴族的、買辦的、裝飾品的教育，改成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與生活打成一片的教育，從曉莊到育才，從灌田的糞桶到苦學生的教育費，他都一身挑起，蔣匪的黑名單來不及殺了他，可是憂憤和辛勞先結束了他的充沛的生命力。他一生的担子也是沉重的。

斌丞先生，他在極端封建極端反動的西北魔王的手下，在蔣匪最親信的頭目的領域裏，在全國反